

三林塘周家宅的家

□张初

1945年10月,从浦东王家渡的小码头下来一对三十岁左右的夫妇,穿着简单,几乎没什么行李,但一看就是城里人,边行边环顾四周。

他们是什么人?到哪里去?

男的是刘燕如,1936年参加革命,受中共上海地下党城工部领导,做秘密交通运输工作,出没于长江两岸,护送许多党的干部和爱国人士进根据地,为前线不断运送西药、军用物资、书籍、电讯器材等等。1944年,受方毅、汪道涵等领导的指示,冒着极大风险,千方百计把一大批无缝钢管和柴油发电机、印刷机、铸字炉等被日军禁运的“大家伙”军用品运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,后来,他成为“51号兵站小老大”的原型之一。女的是张惠英,1944年参加革命,主要任务是协助刘燕如。这对夫妇是我的父母,他们带着一个两岁多的孩子,就是我。

他们此刻要去三林塘周家宅。

为什么一家人奔这个无亲无故的地方?

因为不久前他们的地下工作遭到破坏,已经无家可归。当年8月,父亲接到指示,迅速一批用于电台发报的甲电池及英文打字机到苏北我军。他采购以后自己运送到镇江交给联系人刘二哥,并嘱咐他不要再找以前的当地关系单子华“通路子”,不料刘二哥图方便,仍找了单。单子华是地头蛇,出于投机,曾经帮共产党做点事,日本投降后,看到是国民党来接这一带,赶快投靠,向镇江国民党的“挺进司令部”告密,于是刘二哥和另外两位参与运输的一起被捕,镇江报纸登载了这个消息并说正在追捕刘燕如。

父亲分析情况,判断对方之所以追而不捕,多半为了压榨敛财。既然是自己这边出了问题,就自己来设法营救这三个人。通过种种关系,疏通了“挺进司令部”的司令、参谋长和城防司令,对方提出除没收所运物资外再付五两黄金就放人。为此,父亲出售了自己四川路房屋的居住权和家具,典当了他和我母亲的所有衣物,凑满数赎出了三人,而自己上无片瓦,身无分文,衣食不周。组织上让他暂停地下交通工作,到党的外围组织“益友社”担任地下党团书记,仍无住处无薪水。父亲借居熟悉的瑞祥百货商店楼上,吃饭靠“益友社”三位同志凑,“三个人的饭四个人吃”。母亲带我暂住亲戚家。显然,这样是混不了几天的。

瑞祥百货的中年职工周泉根看到了我父亲的窘迫,虽然父亲认识他,并曾介绍他到瑞祥百货当职员,但绝没想到周泉根那天个别留住父亲,主动热情地说:“刘先生,我在浦东三林塘的老家有房子,你和太太可以去住,不要钱的。”父亲心里一热,非常感激,于是携妻女渡黄浦江到周家宅,总算有了个家。

周泉根的两座老宅,瓦顶,竹篱笆墙。南北向的正屋住着他的母亲,我们叫“阿奶”,带着媳妇孙子住,周泉根有两个儿子金渔和金祥。东西向的偏屋,有一个堂屋和半间房的卧室及一个灶间,让我们一家住。卧室的木地板下面有空档,父亲正好把许多进步书籍藏在那里。正屋和偏屋外面是一个独用的场地。可以打谷、晾晒和供孩子们玩耍。对于我家来说,犹如一步登天。邻居叫我们“刘先生”“妹妹”和“妹妹勤妈妈”。

父亲坚持党的工作,生活来源一度靠地下党战友个人接济,难以继,于是母亲进沪西新裕纱厂做工,天不亮就要上工。她和父亲夜间到“益友社”,等人员散尽以后打个地铺。他们将外婆和舅舅安顿到周家宅家里带着我。纱厂一发工资,父亲买了粮油摆渡送过来。

1947年,父亲看到母亲在新裕纱厂有暴露的危险,于是迅速让她放弃职业,回到周家宅,平时种蔬菜,挖野菜,清苦度日。

1948年,父亲在地下党战友马则先的帮助下到培文印刷厂做会计,并住进甘肃路开封路口一家米店楼上的亭子间,那是印刷厂的房子。这时期,国民党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,党组织让父亲回到地下交通工作,并且立即从上海撤退大批有关党的干部和民主人士,母亲也带着我搬到甘肃路,协助大撤退。当年10月的一天,战友程蔚启带来紧急通知,要父亲立即放弃职业,当天赶到苏州设法护送五位同志到苏北交通站。父亲来不及通知母亲就出发了,另一位战友蔡东园到了甘肃路对我母亲说:“刘先生今天不回家了,你有别的地方要去,可以去。”母亲



父母带女儿张初从浦东王家渡到周家宅。 □汪渊 摄

听懂了,必须离开此地,可选的地方只有回王家渡周家宅。可是当天下午到王家渡的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,只能走一条很远的路,即从十六铺坐渡轮到东昌路码头,然后步行到现在的上南路杨思桥,搭乘从周家渡开往南汇的小火车,在三林塘下车,再步行近两小时才到周家宅,估计途中要六七个小时,母亲立即抱起我去十六铺。

不料,这天母亲正在“打摆子”(疟疾发作时产生寒战,百姓称为打摆子),疟疾病发作,天黑时坐上小火车就浑身冷得发抖,下火车又烧得烫人,只能走两步停一下,我五岁,走一小段就走不动了,母亲实在抱不动,就匍匐在地,让我趴在她背上抱住她的脖子。母亲后来告诉我:“那天夜里漆黑,我肩挎一个包袱,背着你,贴在地上一步步往前挪。你还把腿缩起来说:妈妈,我变轻一点了。当时我想,老刘生死未卜,孩子这么小,我爬也要爬回去!”

母亲那年29岁,但经不住“打摆子”折磨,还是瘫下了。幸亏有个推小车的深夜回家路过,非常同情,他就推着我们母女往前走。母亲说,当她看到了周家宅一片房子的黑影时,心里大喊:终于到家了!到家了!

在那个黑云压城,颠簸流离的年代,周家宅就是我们在危难中可以随时去避难的家。

周泉根是无私的,周家宅是温暖而安全的。对于刘先生夫妇是干什么的,刘先生那些来来往往的朋友是什么人,周泉根心知肚明,他顶着风险做了这件事。我父母和邻居们也心照不宣。这些在白色恐怖下帮着共产党的周家宅村民,为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张开了安全网。

有一位汪渊同志,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我父亲一起做日本铁蹄下的上海难民工作,他为避险由父母陪着来到周家宅,背个照相机说“拍拍农村风景”。汪渊住了几天,为我拍了好几张照片,这批老照片成了传家宝,我从父母那里拷贝下来,珍藏至今。

那几年,正是我开始记事的岁数。我记得家里房间的样子,记得大灶用豆秸烧火,没剥干净的豆类里会蹦出两粒烤香的黄豆,妈妈塞到我嘴里,那是最快乐的事。记得阿奶有时候给我在灶膛余灰里埋一小截山芋,我急着等它烤熟。还记得跟着大孩子跑,到了小桥头我就不敢跑了,因为那里拴着一只羊。

1949年,上海解放了!新中国成立

了!父母要报谢周泉根,可是他提任何要求,也不来我家,认为我父母太忙,不必打扰。1956年,我家搬到淮海路培文公寓楼上,那套房子在转弯角,一大圈玻璃窗,楼下是妇女用品商店。国庆节父母接阿奶住到我家,守在窗前,上午看国庆大游行的队伍轰轰烈烈经过淮海路,晚上看不远处人民广场放出绚丽灿烂的烟火,阿奶哈哈笑:幸福咯,幸福咯!

时光流逝,阿奶和周泉根相继去世,周金渔和周金祥也成家立业,搬到市区居住。我1962年到安徽务农和工作,31年后回上海工作,一直想到三林塘去看看,1998年,在新民晚报的一次活动中,我看到来宾名单上有“三林镇党委书记薛颂丰”,欣喜异常,立即请晚报驻浦东记者站长卢方介绍和薛书记认识,他听到这段历史也很高兴,邀请我们全家重返三林塘。年逾八十的父母更是满心欢喜,多处寻访,找到了周金渔和周金祥,请他兄弟俩在五一劳动节和我家三代人一起回周家宅老家,我带上了汪渊拍的老照片。

这一趟寻亲访故都被我先生任大文和女儿任春拍摄下来啦:薛颂丰书记、宣传委员孙子和年轻的村干部一处处带路找寻周泉根住房旧址;父母和乡亲们互相打量着惊喜相认;老照片引起大家的感叹共鸣。周家宅旧房子所剩无几,新房子盖了不少,周泉根家老房子也只剩一间堆堆杂物。大家纷纷在新老房子前合影留念。周氏兄弟既高兴又有遗憾,他们的父亲没留下一张照片。我看到周家老宅的竹篱笆无比亲切,在那儿和周金祥两人按小辰光合影时站的位置拍了一张照片,邻居们说,金祥老实人,他参军当过海军的,他的太太周明心做过妇女主任,热心能干。

父母再三感谢周泉根一家的奉献和各位邻居在解放前的掩护,邻居们很兴奋,纷纷说起:

“其实我兜心里都晓得额,格个辰光不好讲出来的呀!”

“我的肠胃毛病还是刘先生依开中药方子吃好的。”

“妹妹勤妈妈教我做针线的,想不到妹妹的因都这样大了。”

也巧,我女儿任春这时20多岁,跟外婆初次住到周家宅的年龄相仿。

2001年,全家再次去周家宅,并约周金祥同行。薛书记和村党支部及卢方站长商议,在村里开了个座谈会,请我父母和村民一起畅谈纪念我们党的80诞辰。大家还送了我父母一架帆船模型,寓意“乘风破浪”。

2015年3月,我和任大文又去了一趟周家宅,这里现在叫三林镇临江村周家宅。老地方盖了新楼房,哦,漂亮!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邻居们,见了都很亲。三林塘的年轻人又记下了这段历史。

如今我也是七十好几的人了,对曾经在浦东三林塘周家宅的家是不会忘记的。抚今思昔,我觉得,只要共产党始终为人民,老百姓就永远是共产党的家;老百姓拥护共产党,自己的家也会越来越好。

(写于2020年12月24日)

注:作者张初,1943年生。原新民晚报党委副书记、文汇报报业集团纪委书记。现为上海报业集团退休干部。其父亲刘燕如,1917年生,中共党员,2017年去世。其母亲张惠英,1919年生,中共党员,2012年去世。



2001年,在镇、村干部及乡亲们的陪伴下,父母(左五、左六)再次来到周家老屋。 □任大文 摄



黄浦江边(油画) □殷实

浦东历史上的严寒

□汪正刚

2020年的冬季,确切地说是庚子鼠年的冬季,在人们的感受中特别冷,冬至以后的12月30日,最高温度是零下1摄氏度,最低温度是零下6摄氏度,郊区部分地区是零下8摄氏度,这天是冬季二九首日。而第二波寒潮又在2021年1月7日出现,温度与上一波基本相同,这天是二九最后一天。这两波寒潮都让人感觉几十年来没有过,好在现在公交四通八达,私家车也如过江之鲫,家里和工作单位都有恒温设备,水、电、气供应充足,食物贮备丰富,医疗保障暖心,人民生活和生产有序进行。

这两波寒潮,让许多人瑟瑟发抖,但在历史上,也算不得前所未见。

上海历史上的冬天曾出现过最低温度零下12摄氏度的极端低温,笔者翻阅了《金桥镇志》,有如下记载:“明正德四年(1509年),极寒,竹柏多枯死,黄浦江冰厚二三尺,域内河道冰封,经月不解。”这次寒潮能让竹子和柏树这些耐寒植物枯死,让河道的冰封一个多月不解冻,可见这波寒潮是如此厉害。而在清代,有两次大寒之年,即“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(1862年1月25日),大雪,门户封堵,黄浦江结冰”“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廿九(1893年2月15日)严寒,大雪,气温降

至摄氏零下12度,黄浦江冰冻,域内作物受损。”上海地区最低温度零下12摄氏度,让黄浦江结冰,大雪封门,我也是第一次知道。要不是有志记载,人们一定以为是胡说八道。民国十九年(1930年),“冬,出现百年罕见低温,1月10日最低气温-11°C。禾稼冻死大半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我从市区回家读小学时,零下五六摄氏度的气温连续一周是常有的,所以我们常在河面冰上抄近路上学。1963年1月25日,最低温度达零下9.6摄氏度。这年的4月6日,温度比4月5日大降19.1摄氏度,最低温度达2.2摄氏度。真是应了“清明断雪,谷雨断霜”的农谚。1967年1月又是达到严寒程度,最低温度降至零下9.2摄氏度,越冬作物冻害严重。1970年的3月12日,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雷暴大风雪气象,平地积雪盈尺,大批广播、电话、输电的线路和线杆被压严重,越冬农作物和大批尼龙育秧棚压塌。

上述这些严重的冰雪、低温灾害性天气,有些我是亲眼目睹,铭记在心头,《金桥镇志》的记载也相当详细。所以今年这两波寒潮的侵袭不算是真正冷,完全属正常,当然三九、四九是否会出现极端寒冷天气还难说,在当前疫情防控阶段,又是低温季节,大家还是要减少外出,注意保暖。

浦东珍珠米

□张惠娟

最美浦农味道

玉米,浦东人称珍珠米,世代相袭的纯正方言。

北方玉米又名“苞谷”“玉米棒子”,穗大粒粗。浦东本地珍珠米,糯、甜、香,皮薄,个头细,颗粒也比较小,可能其身处江南而比较秀气吧。

我从小在农村长大,几乎每家自留地都种珍珠米。春风吹醒泥土,农事拉开序幕。跟着大人一起翻土、平整、起沟,将珍珠米种子埋入土里。几天后,种子在徐徐向上的地温里舒适地翻了个身,冒出细细的芽来。一场春雨过后,珍珠米开始使劲地蹿个儿。在土地的滋养下,似乎不多长时间,珍珠米地便成了青纱帐。闭上眼睛能听到珍珠米拔节的声音,节促叶密,穗生节间,青衣包裹,秸穗鼓肚,赤须垂外。期间多次施肥,松土除草,顺便将两边泥土铲过来盖住根部,稳固结实,预防风雨时倒塌。

入住安置房,离开乡村,作别农田植物。居住高楼,常在窗前眺望,一片片茂盛的珍珠米地散落在农庄周围的零星土地上,郁郁葱葱,生机盎然,那质朴的田野,因为绿色变得柔软多情,成了一片希望的田野。我仿佛听到风儿吹过来的沙沙声响,嗅到阵阵夹杂着甜味的清香,好像又找到我的童年时光。

珍珠米是一种奇美的庄稼,很少有农作物像它那样,个个倔强地昂扬向上。掰珍珠米时一手握紧秆子与珍珠米蒂,一手握紧珍珠米棒使劲往下一折,“咔嚓”清脆、嘹亮,再顺势一扭,硕大的珍珠米棒脱离母体。咔嚓咔嚓,一根又一根,一种收获的喜悦和欣喜油然而生。

新鲜嫩珍珠米水分足,颗粒饱满,用指甲轻轻掐,能戳出水。常有亲朋好友打电话:你在家吗?我送珍珠米过来。

不多一会儿,送货上门说:“这珍珠米自己种的,不值钱。我们一下子吃不了,过几天时间就老了,你帮忙吃一点吧。”瞧他们一脸真诚,感觉不是他们送我珍珠米,而是在替他们解决困难。我能深深感受到他们辛勤的劳作和细腻的情感,当然要领情,又不善言辞,欣然接过珍珠米,只会说谢谢。在充满温情的人与人之间,小小的珍珠米被赋予了春意般的人情温度。

珍珠米长老了,去皮轧光,亲戚朋友又会送来,与赤豆、莲子、红枣、花生等混煮,一般加白糖或冰糖,我则喜欢加红糖,香、糯、甜尽在其中,是上好的羹肴,既是点心又可当主食。

珍珠米爆米花,是孩童时美好而有趣的记忆。将珍珠米倒入那个黑乎乎的葫芦形的机器里,再放几粒糖精,师傅一边拉风箱一边摇动,随着“嘭”一声巨响,一团白烟升起,热腾腾香喷喷的爆米花满满一口袋,等放凉了吃,又香又脆。

煮新鲜珍珠米不是烧熟就行,不像煮米饭这么快。锅里放水要漫过珍珠米,大火烧,须臾,一股诱人的清香便弥漫开来,然后,小火慢慢熬上几个小时,蒸气中便满是香糯之味。煮熟的嫩玉米水灵灵的,热气氤氲,握住玉米的两头,用牙齿轻轻地啃食,细嚼慢咽,充分品尝着珍珠米带来的惬意,满嘴甜滋滋,静静地享受着时光流逝。吸一口稠稠的珍珠米汤,甜丝丝的味道中夹带着浓浓的乡情和故乡泥土的芬芳,品尝到生活的美妙滋味。现在超市、菜场里一年四季都有各地种植的玉米,而对于我来说,最好吃的还是浦东珍珠米。

浦东泥土的供奉和浦东人的慧心,造就了浦东珍珠米,它带着浓浓乡情的味道,乡情的温馨,吃出了一份淡淡的幸福。